

小岗村：“红手印”摁响“惊天雷”

数风流人物

时值夏收，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高标准农田里麦穗金黄，笔直宽敞的马路上卡车、农机川流不息，林立的徽派小楼中乡村振兴银行刚刚挂牌，客户络绎不绝。

小岗，这个被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村庄，迎来了又一年的丰收。如今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40多年前，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山乡巨变，要从当年18位庄稼汉的“红手印”说起。

1978年，安徽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在那个“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分田单干！1978年冬夜，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坐头也甘心。”

这张“生死契约”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文物，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小岗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庄稼汉，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下去。小岗村先后在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等，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实现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福建盼盼集团、北京思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安徽农垦集团……小岗村集体经济来源越来越广，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高”。2016年至2020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169元跃升至27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8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力，掀起了改革浪潮，我们呢？”——“小岗青年创业交流”微信群里常常有这样的讨论。这个微信群里有小岗18位“新带头人”——小岗青年创业之星，还有远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有想法有思路的年轻人。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严余山是群友之一，他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在外打拼多年后，2014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乡发展。“纪念父辈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改革。”严余山告诉记者，当年的那一记“惊雷”如今依旧回响。

（记者陈诺）据新华社合肥电

胡福明：六千字激荡四十年

在南京大学史博物馆，收藏着《光明日报》刊登的、引发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行稿。此外，这里还保存着该文章的最初排版稿、修改稿、作者胡福明与编辑之间的通信等，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文章出炉的过程。

胡福明，出生于1935年7月，江苏无锡人，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喝酒吃蟹的方式庆祝。然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凉水。”胡福明当时很吃惊。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抓住了“两个凡是”，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然而，胡福明感到心里没底。1977年的三四月，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犹豫了一个多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最终占了上风，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夏天，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护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医院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妻子出院时，文章提纲也大致写成了。

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了编辑来信。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福明坦言：“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文章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20世纪80年代，胡福明调到江苏省委工作，虽然行政职务渐高，可他从未停止思考。后来，他还陆续写了《苏南乡村企业的崛起》和《苏南现代化》等著作，持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展。



“全文6000余字，激荡40余年。”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孙乐强说，胡老师的这篇文章，及其身上体现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定力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惟真是求”学风的重要体现。

孙乐强表示，在胡福明等老一代学者的引领下，南京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形成了两个“四位一体”：文本、思想史、理论、现实的四位一体，以及党建、教学、科研、服务的四位一体。“通过对经典理论、当代现实的理解和把握，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

（记者邱冰清）据新华社南京电

袁庚：改革精神照后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蛇口微波山下立着的这句著名口号，让人想起改革先锋袁庚。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广东宝安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

1978年，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僻壤，淡水只有两口井，经济发展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究回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勇于担当的作为，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干劲大增，工程进度迅速推进。工资奖

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渐渐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励机制。

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蛇口在短短数年间启动了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门广场。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说，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如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当年的深圳断然不会产生招商、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

在梁究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

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揭开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序幕。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袁庚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用“若干成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晚年的袁庚，常常请司机带着他在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路看下去，带着欣喜和满足。

2016年1月31日，袁庚因病逝世，享年99岁。2018年，袁庚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记者孙飞）据新华社深圳电

谢高华：“开绿灯”催生“新义乌”

正在浙江巡演的婺剧现代戏《义乌高华》受到观众追捧。剧中主人公的原型谢高华曾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义乌县委书记，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一导向，冒着丢官的风险，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他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谢高华，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打击。

1982年6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经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妇冯爱倩，在县委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更多老百姓摆摊。当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倩的话让他深受触动。

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经商情况进行调研，又带队到温州考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

的精神原则，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为市场松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此，谢高华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年9月5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

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发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首创“兴商建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谢高华曾坦言：“当时，只想着对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谢高华曾经的同事、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守春说，谢高华眼里只有工作，工作特点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实质，干出地方特色。“他用白天80%以上的时间跑基层，用每晚近5个小时的时间在办公室吸收消化，笔记本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备注。”

“谢高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作为开创义乌市场的功臣，他在义乌没有



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也未持有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杨守春回忆说。

1995年，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举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回家”，以此表达感激之情。

“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灵堂现场，这副挽联概括了谢高华的一生。

（记者谢云挺）据新华社杭州电

路遥：用文学激励几代人

今年，《平凡的世界》马文版首次出版发行。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出版30余年，加印超过200次，销量超过2000万册，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出版。它深刻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为外国读者开启一扇了解中国城乡社会的窗口。

在延安大学文汇山，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就安葬于此。在他塑像身后的墙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于陕北清涧县一户贫苦农家。父母供不起他上学，便把年幼的他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为子。

那时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贫穷与饥饿是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贫苦生活锤炼了路遥的精神品格。他曾写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陕北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也成为他一生书写的主题。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全身心投入文学的海洋。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滚滚而来。写作者们在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创作中奋勇探索。凭借小说《人生》声名大振的路遥，却在创

作一部全景式反映1975年至1985年间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性小说。

“一般作者创作长篇，大体想明白故事框架后，就能鸣锣开仗了。但路遥却非常谨慎，他扎实而认真地做了近三年的准备工作。”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路遥传》作者梁向阳说。

路遥先给自己列了近百部中外长篇小说的书目，还翻阅了1975年到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和《榆林报》合订本，手指磨得生疼就用手掌继续翻。

1985年秋，路遥来到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开始了第一部分创作。

在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时，路遥自信满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各种文学创作思潮冲击下，被认为“过于陈旧”。

“面对接连的退稿通知，路遥依然清醒而坚定。”梁向阳说，“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

好在，书中那群经历苦难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打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编辑叶咏梅。在她的努力下，《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全国亿万听众的耳畔，引发巨大的反响。据统计，当年的直接听众达三亿之多。读者来信达两千多封。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在致辞中说：“人



路遥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6年高强度的创作拖垮了路遥的身体。1992年11月17日，路遥在西安因病逝世。1995年11月17日，他逝世三周年后，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学文汇山上。

“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展现出年轻人的拼搏奋进和勇于担当，这是渴望登上时代舞台的奋斗者共同的心声。因此它能跨越时空，给予人们精神力量。”评论家肖儒说。

（记者蔡馨逸）
据新华社西安6月6日电

许海峰：夺首金为国争荣光

举枪，瞄准，击发……在1984年夏天的洛杉矶，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奥运赛场上射落金牌，至此，中国体育史竖起了一座重要里程碑。已经走过近百年历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迎来了中国人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刻。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许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岁月如梭，这段珍贵的历史，被一代代体育人反复传颂。

如今已经退休的许海峰，对近40年前的那次奥运会依然记忆犹新。他当时以为，奥运冠军与其他世界比赛的冠军区别并不大。那是他第三次出国比赛，前两次的亚洲锦标赛和奥运会测试赛，他都拿了冠军。“国旗也升过了，国歌也奏过了，所以这种感觉也比较熟悉。”

许海峰回忆，自己当时就是一头“初生牛犊”“没见过老虎的厉害”，那场比赛他是最后一个完赛的运动员，当裁判员告诉他去领奖时，他才知道自己拿了冠军。

“虽然我知道射击是第一而且是在上午打的，是我们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但我并不知道它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第一块奥运金牌。”他说。

赛后，他逐渐感觉到这块金牌没那

么简单。洛杉矶华侨的轮番庆祝，归国后的热烈欢迎，都让他受宠若惊。他听媒体朋友说，刊载他夺冠消息的报纸都卖空了，他顿时感觉“头皮都麻了”。

这枚奥运金牌来之不易。当年，国内的训练条件比较艰苦，对于那段岁月，他说：“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穷，我来自安徽，那就更穷了，当时整个省队只有两支进口枪，谁去比赛谁才能用，子弹也是，进口的子弹比较稀缺，每个人都没有。”

省队的训练场冬天没有暖气，射击项目又必须长时间把手露在外面，因此许海峰得了冻疮。后来，他入选国家队到北京。北京虽然更冷，但训练条件有所改善，冬天，训练场会有一个很大的火炉保证场地温度，他才不再受冻疮折磨。

成为奥运明星后，许海峰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在拿金牌后不能继续保持状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洛杉矶奥运会回来之后的全国锦标赛是他射击生涯中压力最大的一场比赛。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就重新投入训练，踏踏实实练了几个月，最后比奥运会成绩还多出两环。在那以后，许海峰在射击圈彻底站稳了脚跟。

奥运会之后，许海峰又当了十年运动员。退役后，他作为教练也屡有亮眼成绩：1996年奥运冠军李对红和2000年奥运冠军陶璐娜都是他的弟



子，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作为射击队总教练，率队一举拼下4枚金牌。

许海峰说，新一代运动员最需要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有用的，因为竞技体育需要挑战极限，如果没有一股精神支撑，很容易坚持不下去。现在训练条件和科学训练的水平都比过去好得多，所以现在的运动员要是再有过去运动员身上的那股精神的话，出成绩应该会很快。”

退休后的许海峰依然忙碌，他说，他会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体育精神传承下去。

（记者林德初、赵建通）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